

[北魏] 杨衒之 撰 韩结根 注

洛

阳伽蓝记

古
名
城
文
化
丛
书



山东友谊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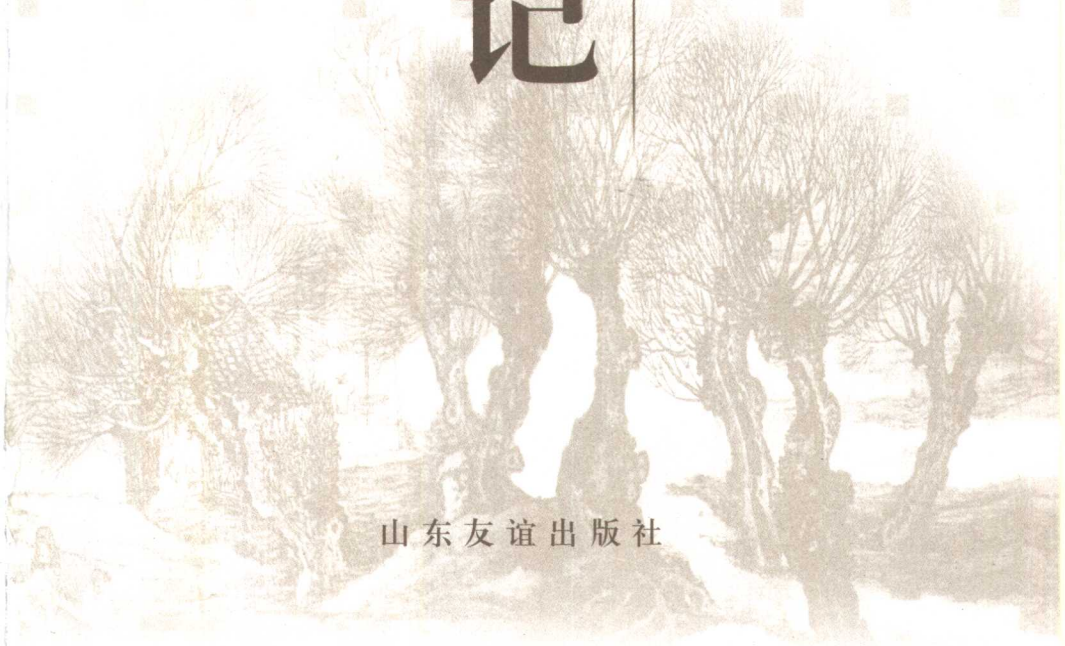
[北魏] 杨衒之 撰 韩结根 注

洛

阳伽蓝记

古
名
城
文
化
丛
书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衒之撰:韩结根注.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1. 1
(古名城文化丛书)
ISBN 7-80642-104-1

I. 洛… II. ①杨…②韩… III. 洛阳-概况-北魏
(439~534) IV. K926. 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9473 号

古名城文化丛书

洛阳伽蓝记

[北魏] 杨衒之 撰

韩结根 注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2 插页 135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642-104-1
K·28 定价: 11.00 元

前 言

《洛阳伽蓝记》，向来与《水经注》一道被人们誉为中国北朝散文著作的双璧。《水经注》是一部以记载水道为主的地理性质的著作，而《洛阳伽蓝记》则是以记佛寺为纲的具有文化与文学价值的历史文献。所以，在介绍这部书之前，有必要简单谈谈当时佛教发展与佛寺修建的有关情况。

印度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汉明帝在洛阳建立白马寺，经过魏晋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繁衍和佛寺的众多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江南春》中的名句，为我们约略勾画出当时南朝佛寺的兴旺景象，而当时北朝寺之多则更为惊人。北魏信佛以建功德求福祉为主要特征，早在5世纪初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时，便已在云冈大量修建庙宇，雕塑佛像。太和十八年（494年），魏孝文帝为摆脱鲜卑贵族保守思想的影响，加强对中原人民的统治，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并以此为契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大量积累，佛教寺院更是大规模兴建起来。据史书载，到公元536年东魏分裂、孝静帝迁都邺城前，全国僧尼已达二百万，佛寺多达三万余所，仅洛阳城内外就有佛寺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寺夺民居，三分且一”。

北魏统治者兴建那么多寺院，大多尽一切财力物力而为之。一方面，它们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庄严富丽的建筑物与风景优美的园林；另一方面，它们的建成又是当时社会风气的反映，是北魏中后期社会生活的侧影。正如恩格斯所

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北魏中后期佛教的兴盛，寺院的大量兴建，是跟孝文帝改革带来的经济繁荣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北魏统治阶级内部爆发了尖锐矛盾，从建义元年（528年）起连续发生大规模战乱以后，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佛寺建筑也就萧条衰落了。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有的书中“杨”误作“羊”，也有写作“阳”的，都不可作为依据），《魏书》、《北史》均不立传，生平事迹不甚可考，有的说他曾任北齐期城郡太守，也有的说他官至秘书监，都不知道确否。不过从本书本卷首署名及卷中自述来看，作者曾任北魏抚军司马，担任过奉朝请，并且亲身经历了北魏中后期的全盛与变乱。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年），杨衒之因有事重经洛阳，看到“城郭崩毁，官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见《洛阳伽蓝记》原序），昔日金碧辉煌、鳞次栉比的寺院官观都成了鸟兽出没之所与牧童野老往返之地，于是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之余，写下了《洛阳伽蓝记》一书。伽蓝，梵文 Samghârāma（僧伽蓝摩）音译的略称，意思是“众园”或“僧院”，即佛教寺院。他之所以写这部书，不单是为了记录北魏佛教全盛时期的概貌，也是为了记叙当时社会的富庶，追溯祸乱的由来，悲慨繁华的消失。因此，这绝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北魏佛寺的书，而且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史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生活、文化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很有价值。

当然，正如其书所显示的，作者的记述是以洛阳的寺院为纲而展开的。全书共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五卷。作者先从城内开始，由里及外，并且表列门名，兼记远近市里、官署、道路、桥梁、时人第宅与名胜古迹。全书记载了洛阳大大小小八十多所寺院（按，此指洛阳城内外寺院，《闻义

里》篇中所记西域寺院不包括在内)。记寺院先记立寺人、立寺时间、寺院方位，再记建筑经构、周围环境并其兴废沿革。市里、官署、道路、桥梁、时人第宅及名胜古迹等也多交待其地理位置，有的还兼记遗闻佚事。这些记载都是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根据它我们完全可以正确地绘出一张北魏时期京城洛阳地理图。而且，作者特别对那些较大的寺院建筑作了详细的描绘渲染。这些描写既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有立体的，也有平面的；有单个的建筑，也有综合的建筑群。它不仅使我们领略到了一千多年前那宏丽优美的宗教建筑艺术，更使我们通过它想见到北魏盛时佛教的繁荣兴旺景象。书中对《永宁寺》宝塔的描写，对《瑶光寺》中西游园的描写，对冲觉寺寺塔佛殿的描写，以及景林寺、河间寺园林的描写等就是很好例证。至于书中所写景明寺四月八日的法会，更是把人们带入一个动态的宗教氛围之中，使我们看到了当时从皇帝到王公大臣，从僧侣到庶民百姓，其信佛达到何等狂热的地步！

《洛阳伽蓝记》在记录北魏寺院的盛况时，还叙述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永宁寺》中就曾提到后来被尊为中国禅宗始祖的波斯国菩提达摩曾经到过洛阳，法云寺专门记载了乌场国沙门县摩罗在洛阳收徒授法之事，而《永明寺》则集中反映了当时外国僧人来华盛况。当时住在永明寺里的异国沙门有三千多人，他们当中最远的西至罗马帝国，南至今天的马来半岛，甚至一些“世不与中国交通”的国家的僧人也来了。北魏佛教的发展，不仅吸引佛徒东来，也引起了僧侣西行求法的要求。卷五《闻义里》就是一篇专门记载沙门惠生与敦煌人宋云往西域求取佛经的文字。宋云与惠生往西域求法在晋法显后而在唐玄奘以前，沿途经历凡二十七国，历时两年多，是中国佛教史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伽蓝记》中的记载为我们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文献。

这些有关佛教文化交流的记载中还记录了所交往各国的社会政治、风土人情、物产出品等。如《永明寺》中就提到大秦“耕耘绩纺，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车马，拟仪中国”，扶南国“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异，饶槟榔”。《闻义里》则记于阗国“其俗妇人裤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乌场国中“假有死罪，不立杀刑，唯徙空山，任其饮啄。事涉疑似，以药服之，清浊则验”等等。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当时人对那些国家的了解，实际上也正显示了对外文化交流的水平。

可以说，佛教文化的交流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整个对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者在《龙华寺》篇关于“四夷馆”与“四夷里”的记载中告诉我们，当时那里住着一万多户外来人口，除了江南人外，西域外商长住洛阳的也不少，所谓“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服，商胡客贩，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这虽然有些过甚其词，但确可窥见对外贸易发达之一斑。没有这样兴盛的对外贸易，也就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交流。

当然，繁盛的对外贸易又必然以本国的经济繁荣为基础。北魏中期，经过孝文帝改革后，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特别是朝廷放松了对伎作户的控制后，民间的手工业与商业日益活跃起来。《洛阳伽蓝记》在描绘佛寺的盛况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如作者在《法云寺》篇记载洛阳大市东西南北四市时写道：“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槨为业，赁辄车为事。”“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作者描绘他们的居住与生活情况是：

“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纓衣；五味八珍，仆夫毕口。”手工业的发展与人们生活的富裕，也使交换关系活跃起来。如书中写到富商刘宝，他在州郡都会之处都立宅养马以通行情，以致各地所卖盐粟货物价格他都能掌握。

工商业的发达必然导致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洛阳伽蓝记》所记载的当时民间杂技百戏之盛，也正是城市生活丰富多彩的一个侧面。《长秋寺》载，四月四日出像时，“辟邪师子导引其前”，艺人们“吞刀吐火，腾骧一面，缘幢上索，诡譎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景乐寺》载：“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扑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之。士女观者，目乱睛迷。”至于秦汉的角抵戏，到北魏也继续有所发展，《禅虚寺》：“有羽林马僧相善觚角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渠，掷刀出楼一丈。帝亦观戏在楼，恒令二人对为角戏。”从这些记载看，当时表演的节目形形色色，场面相当阔大，情节精彩纷呈，观众上自帝王，下至普通青年男女，它充分体现北朝民间伎艺配合城市经济繁荣所获致的高度发展，是我们研究早期杂技史、戏剧史以及城市生活史的重要资料。

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生活的富裕都离不开人材。《洛阳伽蓝记》以佛寺为线索，还描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其中有不少是作者所赞赏的人物。如有“学极《六经》，说通百氏”的卢白头，有“清尚卓逸”、口若悬河的杨元慎，有被誉为“文宗学府，腾班马而孤上，英规胜范，凌许郭而独高”的邢子才，有先在南朝为官、后投奔北魏，因博通旧事而深得孝文帝赏识的王肃，还有风度翩翩、辨慧清悟的元氏诸王元彧、元略等等。作者不仅交待他们的生平、爵里，有的还花费大量

笔墨记其佚事。虽然作者意在反映北魏人才之盛，然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当时北方士人与贵族的风貌。特别是有些人物史书未载，更可补史书之不足。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是站在眼前的废墟上憧憬着昔日繁华的影子，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他当然没有忘记写故国由盛转衰乃至灭亡的原因及其过程。北魏后期世宗元恪死时，肃宗年幼，母亲胡太后临朝称制。后肃宗渐长，母子争权，屡生嫌隙。肃宗十九岁暴亡，胡太后为继续掌权，立皇室宗族中临洮王年仅三岁的儿子元钊为帝。因此时论以为，肃宗之死系胡太后贪秉朝政所致。于是北秀容胡契部落酋长尔朱荣趁机起兵，终至引发大规模长时期的内乱，北魏衰亡。胡太后专政所引发的尔朱荣之乱是北魏由盛转衰的关键性事件，所以作者再三致意，他不仅以永宁寺为横线系统地记叙了这一变乱的详细情况，而且在记载其他佛寺时也多次提到这次变乱及其影响，并且对发动变乱的罪魁祸首尔朱荣及其一伙进行了抨击，同时也对胡太后有所讽刺。

北魏衰亡虽主要是由于尔朱荣之乱，而诸王腐化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北魏统治者是无比荒淫的游牧贵族，孝文帝改革以后，社会经济有了发展，获得财富更加容易，这就更助长了他们养成奢侈的习惯。《伽蓝记》中所反映的元氏诸王奢侈腐化的生活面貌是空前的。如《高阳王寺》中写到高阳王元雍“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于帝宫”。又说他“厚自奉养，一食必以万钱为限，海陆珍馐，方丈于前”。如果说元雍的豪奢还只能代表个别情况的话，那么作者在《寿丘里》中则借这一皇宗聚居地的典型环境，为我们揭示出当时整个帝室王族穷奢极欲的生活面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夸。”其中河间王元琛最为豪首，他经常与高阳王争衡。元琛建造的文柏堂，形状如

同皇宫中的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纆为绳”；又遣使至西域购求名马，“以银为槽，金为锁环”。正是由于统治阶级这种无止境的挥霍，直接破坏了社会经济，使社会矛盾更为激化，所以才有《伽蓝记》中所提及的万俟丑奴、葛荣等人的起事。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奢侈腐化，酿成日后王室削弱，以致尔朱荣起兵时无力制止，只能束手待毙。“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北魏末年的变乱，元氏诸王是不能辞其咎的。

此外，书中还有关于对封建社会史书与墓志虚伪性的讽刺，有对于某些地方风俗变迁的揶揄等等。总之，《洛阳伽蓝记》内容丰富，它以写北魏洛阳佛教寺院的兴废沿革为纲，同时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有关事实，是一部“反映一个时期，一种宗教，同时又是反映一个京师，一个王朝的历史文学”（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

然而，《洛阳伽蓝记》之所以能在一千多年来一直吸引读者，长盛不衰，还不仅仅由于它的内容，同时也有赖于它的描写技术。在这方面，首先要注意的是它的精彩的语言艺术。前面提到作者为我们状写了那么多的寺塔园林，有的壮丽辉煌，有的清新动人，有的形象飞动，使人如履其境，这就靠的是语言艺术。《伽蓝记》精彩的句子俯拾即是，这里我们不妨再举两例。如《闻义里》中写惠生与宋云往西域取经，一路上的景色就写得很生动：“是时八月，天气已冷，北风驱雁，飞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钵和国。高山深谷，险道如常。国王所住，因山为城。人民服饰，惟有毡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风雪峻切，人畜相依。国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结，望若玉峰。”文字干净整齐，写景状物，犹如画图，就中特别是那“北风驱雁”四字，简直把当时情景写活了。“北风”本来是无生命的东西，在作者的笔下一下子显得有了灵气。又如作者写善持山：“王城南五百里有善持山，甘泉美果，见于经记。山谷和

暖，草木冬青。当时太簇御辰，温炽已扇，鸟鸣春树，蝶舞花丛。宋云远在绝域，因瞩此芳景，归怀之思，独轸中肠，遂动旧疹，缠绵经月。”宋云因看到善持山那美丽的景色，触发了回乡的念头，不知不觉生起病来，而我们读了作者这么漂亮的句子，大概谁都会想到，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到那儿去游历一番的。

善于运用富于个性化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人物也是《洛阳伽蓝记》描写技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在《寿丘里》一文中，作者写到河间王元琛不仅攫有大量财富，而且常常大言不惭地对人说：“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腋，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为显示自己豪富，他引诸王巡按府库时，突然对章武王元融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几句表白，活画出一个穷奢极欲、狂妄骄横的统治者形象。章武王元融看到河间王元琛的财富比自己多，“还家卧三日不起”；而当胡太后让大臣背绢回家时，元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这些细节把人物的心胸狭窄与贪得无厌表现得非常传神。与此同时，作者还常用对比反衬的手法来增强效果。如《高阳王寺》篇写到高阳王元雍他“一食必以万钱为限，海陆珍馐，方丈于前”；而陈留侯李崇虽也是富倾天下，但每餐吃饭时只有熟韭菜与腌韭菜，一个是挥霍无度，一个是惜财如命，两相对照，人物的特点就跃然纸上。

《洛阳伽蓝记》描写技术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字的结构。它在记载佛寺时，还写了许多有关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很多可作小说来读。其中像《景宁寺》记杨元慎事，《正觉寺》记王肃事，《法云寺》记田僧超的故事，《寿丘里》记元氏诸王事，都是记人间言动与社会风尚的，也即习惯上所称的志人小说；而《崇真寺》记比丘惠巖受阎罗王检阅而复活事，《秦太上公二寺》记洛水之神，《菩提寺》记崔涵的遭遇，《法云寺》

记孙岩被狐妖割发等，则都属于志怪一类。跟它以前的志人小说代表作《世说新语》及志怪小说代表作《搜神记》相比，它的文字篇幅加长了，而且有比较完整甚至较为复杂的情节，人物形象也更为丰满。如《正觉寺》写王肃的故事，所叙不止一事，登场人物十多个，有正面叙述，有追叙，有对话，内容与规模就非《世说》之记一人一时的言谈或行动者可比。再如《菩提寺》中写崔涵的故事，情节曲折，跌宕起伏，就较《搜神记》的故事更富于趣味性。它在结构上的这种进步，使它成为从魏晋小说发展到唐代传奇的中间环节，在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在介绍了《洛阳伽蓝记》的特点和成就以后，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本书的作者是否反佛的问题。以前绝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洛阳伽蓝记》是一部反佛的著作。书中确实有关于反对信佛的浮滥和糜费的文字，但也有不少地方宣扬了佛教的威灵显赫。如《平等寺》中写佛像“常有神验，国之吉凶，先炳祥异”，每逢变故，佛像就流泪。《昭仪尼寺》写窃贼欲窃佛像，“佛与菩萨合声喝贼，盗者惊怖，应即殒倒”，结果被抓获等等。所以我们认为，作者反对的只是崇佛过程中的一些弊端，而并不是佛教本身。《广弘明集》第六《叙列代王臣滞惑解》中曾引及作者给皇帝的上书，其中在历述崇佛过程中的弊端后，结束时说：“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尊，师徒无滥。……”可以说，这也是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

最后谈谈《洛阳伽蓝记》的校勘与注释问题。

《洛阳伽蓝记》的版本很多，仅明清以来，就有二十几种刻本（详附录《洛阳伽蓝记版本目录》）。现存最早的是如隐堂刻本，约出于明嘉靖间。今人周祖谟先生与范祥雍先生分别以此为底本先后撰有《洛阳伽蓝校释》（以下简称《校释》）与《洛阳伽蓝记校注》（以下简称《校注》）。根据选定版本从古从

善的原则，本书也以如隐堂本为底本，而以吴琯《古今逸史》本、《广汉魏丛书》本、绿君亭本、真意堂活字本、吴若准《集证》本等作为参校本，并参考了其他有关资料，尤其是注意吸收周祖谟先生与范祥雍先生的整理成果。

本书校勘，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连贯起见，没有依前人例将校文置于正文之下，而是将校勘记置于文末，以注释的形式出现。正文如有讹夺，前人已有定论的，即予以改正，并在校记中注明“某，原作某，据××说改”，或“据××说补”；前人未有定论，或虽提出一说但证据不足而我们有一孔之见的，则不予改动，而将我们的管见写入校记中。依刘知几《史通》说，杨銜之著《洛阳伽蓝记》曾自为子注，不知何时子注与正文混在了一起。清代顾广圻、吴若准与唐晏根据此说，曾先后试行分析正文与子注，或没有分析成功，或因分析有缺点而遭人讥议；周祖谟先生在《校释》中更是旁征博引，予以重新区分。应该说，他们的这种努力，为《洛阳伽蓝记》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是我们考虑到，1. 我们今天没有找到更古的本子或正文与子注不同定例的确论，2. 我们这个本子是适应一般读者的需要而整理的，因此，我们还是依照如隐堂本原样，没有采用正文、子注区分的体例，仅在《凝玄寺》一篇中有一条注文，因为前面冠有“注”字，我们是把它作为注文处理的。

本书注释文字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1. 文字解释；2. 文句文意的疏通；3. 人名、地名的考订与注释；4. 北魏政治、宗教、社会史事的补充及考订；5. 有关佛教典故传说的诠释；6. 校勘记。我们考虑到这是一本普及性的读物，所以在注释文字时，一般采用从详的原则。人名诠释则交待其字号、爵里、生平事迹，有的还注明传记出处。地名则注意其古今历史变迁。本书所述及历史事实过简或与他书有出入者，则

酌引他书予以参证。必须说明的是，本书中（尤其是卷五“闻义里”条下宋云、惠生至西域取经一文）有许多佛教典故传说，其中有很多迷信成分，但又不能不按佛书注释，相信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读者是能正确对待的。

《洛阳伽蓝记》由于流传年代久远，辗转传抄翻刻过程中错字脱文在所不少，前人特别是周、范二位前辈卓有成效的整理研究工作对注释本书帮助很大，但也有些问题至今仍无法解决，这便给本书注释带来了困难。如卷三“景明寺”条有“山悬堂光观盛”这样一句话很不好理解，周祖谟《校释》与范祥雍《校注》都认为其中有脱文，这是很对的，而脱去的文字是什么，则无从查考了。我们便只好在注释中说：“‘山悬’与‘堂光观盛’之间缺乏内在联系。”这样的注释当然是不尽人意的，但目前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其他类似的情况还有，不能一一列举了。总之，在《洛阳伽蓝记》注释工作中困难不小，我们虽然下了一点功夫，但由于主客观原因，肯定还存在不少问题，恳切希望能得到方家及广大读者的指教。

当我写完这篇前言的时候，已是凌晨四点了。万籁俱寂中，我想起了十年前我应高校古委会之约为巴蜀书社选译《洛阳伽蓝记》的情景。记得当时也是在这样一个清晨完成初稿的，由于《选译》得益于周祖谟《校释》、范祥雍《校注》研究成果匪浅，我在结束语中写下了向二位先生表示感谢的话。而今天，周先生已经做古，我再也不能向他说“感谢”二字，只能在心里默祷他的灵魂安息，而我自己也即将步入知天命之年，想到这里，我感到了莫名的悲哀，更加觉得窗外初冬的寒意袭人。然而，正如我师章培恒教授所说的：“生命有时虽很脆弱，但却总在延续和前进。”周老前辈虽已长眠地下，他的研究成果却永远有惠后学，他是为生命的延续和前进尽了力的；我的学术造诣虽远不能和前辈相比，但总也算为学术的薪

继火传做了一点微薄的工作，这样一想，心中便不觉释然许多。

韩结根

1999年11月28日于复旦大学第四宿舍

目 录

前言	1
洛阳伽蓝记原序	1
洛阳伽蓝记卷第一 城 内	10
永宁寺	10
建中寺	40
长秋寺	43
瑶光寺	45
景乐寺	48
昭仪尼寺 愿会寺 光明寺	50
胡统寺	53
修梵寺 嵩明寺	54
景林寺 建春门	56
洛阳伽蓝记卷第二 城 东	63
明悬尼寺	63
龙华寺	64
瓔珞寺 慈善寺 晖和寺 通觉寺 晖玄寺 宗圣寺 (见后) 魏昌寺 (见后) 熙平寺 崇真寺 (见后) 因果寺	65
宗圣寺	66
崇真寺 宝明寺 (见后) 城内般若寺 城西融觉寺 (见后) 禅林寺 灵觉寺	67

魏昌尼寺	70
石桥南景兴尼寺 灵应寺	70
庄严寺	75
秦太上君寺	75
正始寺	79
平等寺	85
景宁寺 宝明寺 归觉寺	93
洛阳伽蓝记卷第三 城南	104
景明寺	104
大统寺 招福寺 秦太上公二寺	110
报德寺 大觉寺 三宝寺 宁远寺 承光寺	113
正觉寺	114
龙华寺 追圣寺 归正寺	118
菩提寺	126
高阳王寺	128
崇虚寺	132
洛阳伽蓝记卷第四 城西	135
冲觉寺	135
宣忠寺	138
王典御寺	141
白马寺	142
宝光寺	144
法云寺 灵仙寺	146
阜财里内有开善寺	154
寿丘里 河间寺	156
追先寺	163
融觉寺	167
大觉寺	169